

《民主的細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主的細節》

13位ISBN编号：9789620431210

10位ISBN编号：9620431219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作者：劉瑜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民主的細節》

內容概要

這本書是作者在美國的幾年中給國內的一些期刊報紙寫的專欄文章結集，其中主要是給《南方人物週刊》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主導思想」，與其說是某種政治理念，不如說是對一種缺乏精確性的議政方式的反感。所以，在寫這個系列的文章時，作者儘量講故事，找資料，把「美國的民主」這樣一個概念性的東西拆解成點點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敘事說理深入淺出，觀察評論理性睿智。

《民主的細節》

作者簡介

1975年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在劍橋大學任教。目前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工作。從事時政專欄寫作多年，2008年被《南方週末》評為「年度專欄作家」，2011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評為「中國青年領袖」之一。

《民主的細節》

精彩短评

- 1、很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书中更多的是表面那一层。民主搞不好就要变民粹了。
- 2、在早餐的间隙读完的~
- 3、2014.10 “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 “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读之前我并不知道刘瑜大抵是个还挺感性挺能逗趣的人。
- 4、网上下了一个刘瑜随笔，果然还是有几篇被删掉的呢
- 5、易读不枯燥，适合入门启蒙
- 6、略逊于熊培云的思想国。
- 7、轻松睿智，温和从容，好书！（最受不了那些明明就想说“这顿饭很好吃”非得要表达成“这些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混合物的刺激味蕾的时候很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那类装逼货）
- 8、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一看到鼓吹在美国生活有多么好的文章就觉得特别无聊。特别要批评的是，在《至少，还有记忆》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到美国人有不断对自己国家犯下的错误进行反思的传统，例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越战的反思等，但是美国人对自己曾经反华、反穆斯林的历史又有多少反省呢？如果有反省，那为什么美国媒体偶有对华人出言不逊的事件发生呢？这就说明美国人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领域。所以，我认为，美国人的反思历史也是“选择性反省”。
- 9、小故事，涵盖民主的滴滴细节
- 10、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民主倾诉。
- 11、刘瑜2003-2008期间为报刊专栏撰写的系列以「美国的民主」为主题的政治写实随笔。美国作为一个整体，二战之后在世界事务中实行霸权主义和商业主义不论，但其内部的政治结构设计与社会治理经验，提供了一个至少到目前仍焕发着蓬勃生命力和强大的自我纠错更新能力的成功典范。围绕着民主这个话题，刘瑜另辟蹊径，将政治生活中「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从对「事实的掌握」的维度、以有别于托克维尔的角度，去剖析美国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力求精确性的议政方式所赖以维系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在她看来，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从立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制衡的制度设计，使得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的均衡互动成为可能，自由、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枝蔓成长，维系了长期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
- 12、说来惭愧，我一直不知众人所说民主为何物，读罢此书，更是对民主二字多了一些疑惑
- 13、很轻松，也很深刻

章节试读

1、《民主的細節》的笔记-第80页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实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达叙事诗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他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他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历史的巧妙正在于此：它不仅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2、《民主的細節》的笔记-摘記

我写这些文章的“主导思想”，与其说是某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对一种缺乏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反感。多年来我们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判断“西方制度”的好坏，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写这个系列的专栏文章时，我尽量讲故事，找数据，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所以这本书叫《民主的细节》。

我始终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判断不同，往往不是因为价值观或者智力的差异，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的掌握不同。

我在刻意地做一件很“笨”的事情：写生，尤其给那些显而易见却又常常被忽略不计的事情写生。知识分子的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掘和勘探，所以很多人宁愿去寻找墙缝里的秘密宝藏，而不愿去指出“屋子里的大象”，而这本书就是关于“屋子里的大象”。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近200年前，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后，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主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这话可以做多样的解读，我的理解则是，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激进国家。那些国家历史上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

《民主的細節》

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前述激进国家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民主”，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的“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

与其说它反映了“邪恶的政客、资本家与善良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内部、人性内部对不同价值的追求。本质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个体主义政治观和集体主义政治观之间的认识论差异，而人的个体性，和人的“阶级”、“种族”、“宗教团体”、“性别”等集体属性，都是政治必须正视

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由于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王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西方国家的制衡传统很发达。美国“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就发挥了这种“充分制衡意识”，所以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构造却打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民主”成了制衡的一个衍生物，它的众多维度之一。
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这个“制衡机器”的运转。

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都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

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

作为政治制衡的一种方式，它在降低当权者的专断性、促进社会公正和福利、塑造人的公共责任和意识方面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从来不是民主的最大化，而恰恰是民主与自由、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3、《民主的細節》的笔记-【摘记】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2008）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又收获两记重拳。2008年5月布什的前新闻助理Scott McClellan出了一本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白宫和华盛顿欺骗文化的内部》，指控布什政府长期运转操控一个“宣传机器”，在伊战问题上误导民众。6月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判决中裁定，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籍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美国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等于司法机构直接朝布什政府扇了一个耳光。很多人预测

，“9·11”以来布什政府苦心经营的关塔那摩监狱已经来日无多了。

当然，中国有句古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两记重拳，对于每天被媒体“群殴”、头像都被商家印到厕所手纸上的布什来说，可能也不算什么，不过是每天收到的无数臭鸡蛋里面的两枚而已。事实上，2003年以来，随着民众逐渐对伊战失去耐心，布什政府在民主党、媒体、民间团体和公众面前已经在节节后退，只有招架之心却无还手之力了。

最明显的就是布什的“领导班子”所遭受的重重打击。Donald Rumsfeld，他手下在任6年的国防部长，伊战的主要推动者之一，200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之后，面对民众对布什政府的声讨压力，不得不以辞职来为共和党挽救声誉。Paul Wolfowitz，2001—2005年的副国防部长，被很多媒体称为“伊战设计师”的幕后人物，2005年6月刚被布什政府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干了不到两年，仅仅因为在世行工作的女朋友升职问题而被赶下了台，虽然有评论认为这是政治报复，他还是不得不黯然离去。Alberto Gonzales，布什手下的司法部长，因为解雇几个手下的律师程序可疑，2007年8月不得不辞职以息民愤。Lweis Libby，副总统切尼的“前办公室主任”，因为抖露了一个中情局工作人员的姓名而被判坐牢两年半，由于总统的特赦才免于坐牢，但是政治前途毁于一旦，律师执照也被取消。Harriet Miers，布什总统的白宫助理之一，2005年10月曾被布什提名为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结果舆论抗议，布什不得不很快收回提名。最令布什痛心的恐怕是Karl Rove的离去。Karl Rove是布什的主要政治顾问，被认为是布什两次当选总统的最关键人物之一，布什当选总统之后长期担当白宫战略办公室主任、政治事务主任和公共关系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和布什“肝胆相照”的“铁哥们”，2007年8月也不得不因为与上述“律师解雇案”和“中情局人员泄密案”有关联而辞职。堂堂美国一个总统，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却只能看着自己的“哥们”一个个纷纷落马而无能为力。

也许在很多夜深人静之时，小布什会觉得委屈，他可能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为美国的安全日夜操劳，美国人民，哦，不，世界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我滚蛋呢？

说起来布什的确有些惨。“9·11”之后他的支持率曾高达90%，现在却徘徊在30%，据说是民意调查以来美国总统支持率的谷底。8年前若是知道自己会得到“史上最低支持率”这份“殊荣”，不知道还会不会热火朝天地参选总统呢？

“倒霉”的核心事件，当然是伊战。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伊战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建成一个国泰民安的伊拉克。

不过，当人们为了伊战的失败而纷纷声讨布什时，有一点却常常被忽略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曾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如果你反对伊战的话，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一个表现，但却不能说它是总统独裁的表现。

当然，当所有人现在都可以装作自己与伊战毫无关系时，只有一个倒霉蛋不能“逃离沉船”，那就是布什。希拉里可以轻松地说一句“我被误导了”从此摆脱干系，普通民众更可以如法炮制，甚至连布什阵营内部的人，都可以说：“布什政府大大低估了战争的难度，根本没有准备充分合理的战争策略去应对这场战争。”意思是，就算布什政府不能算作邪恶，也够笨的了。

Richard Perle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布什政府的国防委员会成员，一个被称为“黑暗王子”的鹰派外交人物，曾经力主伊战，2006年接受采访时却说：“如果早知道会是这个样子，我当时会建议还是考虑别的策略吧。”另一个曾经力主伊战的外交家Kenneth Adelman，现在接受采访时说：“布什的决策班子是二战以后最无能的一个团队。”被视为“输出民主”倡导者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现在也站出来说：其实，我与伊战的思想渊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向来是主张政治制度变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不是贸然“移植民主”。

然而，所有这些人，包括那75%的曾经支持伊战的民众，都是“无辜”的吗？就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上是“被误导”了，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支持，却不因信息对错而改变。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且在于即使它是正确的，它是否能够作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制国家不是一个两个，难道都要一一去武力入侵？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人们5年之后的“马后炮”之见是否定的，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不是他们当年的回答。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所有这些曾经支持伊战的人，难道又都是“有罪”的？且不说他们大多在信

息上被“误导”，就是对“先发制人的战争”、“军事移植民主”这些理念的支持，我们就能用今天“马后炮”之见去要求“9·11”之后、伊战之前的美国人吗？

让我们回到“9·11”之后，伊战之前。

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定性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由于“新保守主义”这个词和布什政府、伊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媒体、学术等公共领域，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用语。然而最初，它其实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里根时代慢慢渗透到决策圈，到小布什时代才在政府中站稳脚跟。核心人物包括一批犹太裔的、由自由左翼转向保守右翼的“纽约客”：Irving Kristol, William Kristol, Nathan Glazer, Irving Howe, Robert Kagan, Richard Perle, Kenneth Adelman等等。与左翼常常以大学为“阵地”不同，右翼“新保守主义者”的“阵地”则是一些智囊机构和杂志，比如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udson Institute等机构和National Review, the Weekly Standard, the New Republic, Commentary等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左翼更多地走的是“发动群众”的“下层路线”，而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走的则是影响决策的“上层路线”。

新保守主义，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主张，那就是“以强硬意志来推行自由民主”，用一个时评家的话来说，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有趣的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应该截然对立的概念，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指的却是同一套观念体系，主张的都是自由的拓展，只不过“新保守主义”更侧重政治、外交、文化领域，而“新自由主义”更注重经济领域。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9·11”左右到达顶峰并不奇怪。冷战的终结至少从三个方面推波助澜了新保守主义，首先是里根的军备竞赛的确拖垮了苏联，从而使美国外交决策圈里鹰派人物信心大增，相信强硬手段是捍卫美国地位和利益的必然方式。其次是前苏东政权在一两年之内豆腐渣工程般哗哗倒塌，令美国人看到专制政权的“空心性”，从而相信任何专制政权都是不堪一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伴随着冷战终结而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它势不可挡地席卷了南欧、拉美、东亚、东欧，令西方世界对民主化产生了极端乐观的情绪，无论政界、媒体还是知识界，都有一种思维，认为民主制度具有一种“万有引力”，任何倒塌的专制制度会天然地向它回归。这种外交鹰派思维、对专制制度弹性的低估、对民主转型轻松度的高估，加起来，就为“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而“9·11”的发生，则再为这种新保守主义思维打了一针兴奋剂，它明确了敌人——“恐怖分子”和“流氓政权”，激起了美国人的安全焦虑，还唤起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将“道德主义”和“军事主义”都推到了顶峰。

所以问题不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否正确，而在于对一个军事情报的分析方式：即使是一个错误的情报，在一个温和的氛围下，本来也可以做保守的分析和审慎的反应，从而避免一场鲁莽的战争。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加上“9·11”激发的爱国热情，使得布什政府乃至很多议员、媒体、民众不可能以一个温和审慎的方式来诠释一个模糊情报，他们“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从而选择了伊战。伊战的起因与其说是布什及其身边一小撮“坏蛋”刻意欺骗民众，不如说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信息面前，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使得布什政府选择了鹰派的诠释方式，导致了冒险主义的战争策略。如果说信息错误本身应当由情报人员负责，对情报的选择性分析应当由布什及其智囊团负责，但推动这种“选择性分析视角”的却不是一个人、一小撮人，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代人。

所以说“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道德失败，而是人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历史时期之后一次新的政治探险的失败。这个历史时期之所以陌生，就在于它是现代化以来人类第一次走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左右之争当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但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斗争基本都是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基本公共生活框架之内，用福山的话来说，人类已经失去了“他途”。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末，“上帝”又死了一次，只不过这次死的不再是那个基督教会的上帝，而是启蒙运动造就的那个“理性主义”的上帝。

在这个全新历史时期的政治实验，就是“以强力推行自由民主”，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具有反讽性的是，“资本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据说是“自然秩序”对“人为秩序”的胜利，而新保守主义者用军事手段去推行自由目的，用“人为方式”去推行“自然秩序”，用激进去奠基保守，就如同“方的圆”意义一样，存在内在的矛盾。“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联姻之所以失败，也许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这个内在的悖论。

就是说，新保守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好和刚刚被他们击败的意识形态对手一样：高估政治对于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功效。众所周知，政治就像一个社会的方向盘，一切公共福利的改善，在一定意义上都必须从政治开始。新保守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急于去“拔苗助长”地改造

“落后的政治体系”。然而匆忙之间被遗忘的一点是：“方向盘”对于“驾驶安全”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司机再善于把握方向，如果碰到恶劣的天气、垮掉的道路、交通规则或缺失、横冲直撞的行人，也不可能把车开好。而政治的“限度”，就在于它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历史、落后的经济水平、分裂的社会结构、对立的族群认同……政治实验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无菌无毒的真空环境里发生。

在新保守主义者所有的“盲目乐观”里，有一项是代价最惨重的，就是对国家整合的假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终究要装进国家这个“容器”里，所以国家的整合是民主的前提。这种“国家的整合”，既包括民众对这个国家基本的认同和忠诚，也包括政府有基本的能力维持秩序和实施政令。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在“好的政治制度”和“坏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学者亨廷顿曾经在1960年代提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治的程度”比“统治的方式”更重要，今天对照着伊拉克的经验来看，这话更加发人深省。

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两个因素，是不能被“假定”的。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决策者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坏的情形除了可能变好之外，竟然还可以变得更糟。在政治当中，具有万有引力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萨达姆的垮台固然迎来了“民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摧毁了国家的整合。一方面，伊拉克爆发出来的民族、教派、地方矛盾削弱了伊拉克人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军阀的林立使得中央政府到处政令不通。教派的军阀化，军阀的议会化，构成了伊拉克民主的现实。美国人兴冲冲地给伊拉克献上了“民主之花”，却发现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插上这株花的“花瓶”。

其实国家整合的缺失阻碍了民主进程也不是没有先例。便是冷战之后，波黑地区的一片混战就也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但是冷战西方的胜利、专制政府的不堪一击、加上风起云涌的第三波民主，让美国政府、甚至普通民众在胜利的欣快感中忽略了这些“不和谐音符”。很多人指责美国政府当初“根本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看来，这种“缺乏准备”里最显然的，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充分预见到伊拉克这种教派军阀化的局面。比如一个记者George Packer的调查指出，当初五角大楼在备战时，还以为到2003年夏末，占领伊拉克的13万美国士兵大部分都可以遣返，只需要2万5千个士兵留守就行了。事实是，为了维持伊拉克的基本秩序，到2007年美国的伊拉克驻军有增无减，已经高达15万，可见今天的现实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预计有多么不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时的美国国会甚至美国媒体、民众就预见到了这种国家整合垮台的局面吗？当初的各种反战声音里，有反对“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个理念的，有质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论据的，有抗议战争本身的不人道和非人性的，有追问战争的经济代价的，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但是在伊拉克的战后形势展开之前，有几个预见到教派军阀化会成为重建伊拉克最大的障碍呢？

几年之后，伊战“设计师”之一的Richard Perle说：“我们考虑到了会有所失望，但没想到现在的情况却是绝望。”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会成为另一个日本、另一个德国，在战后美国的帮助下走向民主、和平和富强。倘若如此，如那个网友所说，布什确实会青史留名了。可惜，伊拉克不是日本或德国，它既没有战后德国的赎罪意识，又充满了日本、德国所没有的种族教派裂痕，“解放”不是把他们提升到了自由民主的乐土里，而是推向了霍布斯所描述的“狼群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盲点，就是轻视人对“身份认同”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此强烈，它往往可以——至少暂时地阻截人对“普世价值”的拥抱。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近年来反战的声音总是和声势更浩大的反美、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甚至反现代化的声音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如果说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推动了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这种崛起很快在21世纪初目睹了一个如影随形的左翼回潮，而反战则给了所有这些左翼的声音一颗最有力的“弹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外交上的冒险，而且是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性事件：很多人，尤其是穆斯林教徒，将它视为西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开端。“异端们”已经为全球化的文化后果而焦虑了，通过军事手段来传播文化价值则更令人惶恐。当新保守主义者“一声炮响”，给落后国家送去“普世价值”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也许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民主化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变成了“你”，那么，“我”是谁呢？

正是对社会结构、文化条件、经济水平、身份认同这些因素的忽略，使新保守主义的实验成为乌托邦主义的一种。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使人类得到一个左翼乌托邦的教训，新保守主义实验则是人类得到了一个右翼乌托邦的教训。当然好在由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纠错机制，这场激进实验很快就扭转了回来，其代价比起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灾难，只能说是九牛一毛。2000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意气风发开始掌权的时候，而2007年我离开美国时，布什政府却是在伊拉克伤亡记录的每日刷新

《民主的細節》

中垂头丧气焦头烂额，成为大街小巷的一个笑料。用Kenneth Adelman的话说，新保守主义已经元气大伤，在一代人之内不可能卷土重来。现在布什总统已经“众叛亲离”，成了给“新保守主义”这个理念站岗的最后一个人，即便是他，很快也要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下岗”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新保守主义的反思却也不能矫枉过正。值得反思的是它的“军事主义”的手段，而不是它“道德主义”的目的。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认识论根源，据说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反抗。被视为新保守主义思想鼻祖的列奥·施特劳斯说过：“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口味问题。”今天的世界，仍然面对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各种专制政府仍然在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为其专制辩护。“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教训是用武力改造世界的得不偿失性，而不是扬善避恶的不可能性。只是保守主义者今天必须接受的是，与武力相比，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或哪怕政治遏制都是更有效的“输出民主”方式。最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主国家如果自己能够发展得蒸蒸日上，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光芒。政治是有限度的，但政治不是无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布什政府不是一届成功的政府，但布什时代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见证了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激进冒险，目睹了它的兴盛和失败。这个失败却不是无意义的，至少它在一个崭新时代，为我们勘探了政治的边界，再次提醒了人类激进主义——无论来自右翼左翼的危险。失败也许是布什的，教训却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个政治暗礁的位置，又为看到自己的无知而变得智慧了一点点。

《民主的細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